

从“放达”到“纵横”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陆德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偁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阉,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关键词:放达;纵横;独善;吏隐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5)01-0044-05

宋初诗人林逋评价王禹偁诗说“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①(卷三),不仅指出王禹偁与白居易之间的师承关系,也揭示了二者诗歌的不同风貌,即白诗“放达”而王诗“纵横”。从白居易的“放达”到王禹偁的“纵横”,这个转变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学史的演进,也反映出士人精神状态的变化。王禹偁是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也是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探究他在什么样的文坛风气背景下学习白居易,他又在哪些方面突破了白居易的“放达”,他的“纵横”又赋予宋代文学以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就很有必要。现有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稍显简略,本文拟从白居易、王禹偁不同的人生思想、个性气质入手,分析“放达”、“纵横”在他们各自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揭示其文学史的意义。

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早年的文学观功利性很强,但在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后,白居易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其文学活动也可以元和十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此前主要考虑如何实现“兼济”之志,贬官之后,如何才能“独善其身”成为白居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白居易看来,“独善”就是求“适”,只要“识时知命”、“适”即可

得。从此以后,求“适”代替了求“用”,白居易一改任谏官时的执著,对人生完全采取“放达”态度。白居易的“放达”不同于魏晋人的不守礼法,而是超然于现实矛盾之上,以此达到全身远祸的目的。文如其人;“放达”的人生态度,必然对其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白居易不再把诗歌当作教化补失的利器,而只是他追求“适”的手段,诗歌内容也多表现其闲适生活和自得之情,如《咏意》:

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能者,饱食但遨游。平生爱慕道,今日近此流。自来浔阳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与时沉浮。朝餐夕安寝,用是为身谋。此外即闲放,时寻山水幽。春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白居易集》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135页)

与此前“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②(p.15)的执著精神大相径庭。不辨黑白,与世沉浮,自由闲放外,无所用心,把谪所

* 收稿日期 2004-10-16

作者简介 陆德海(1974-),男,江苏淮阴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万方数据

当作庄子的“无何有之乡”，逍遥其中，诗歌风格也由“讽谕诗”的意切言激一变而为舒缓。与人生态度的“放达”相一致，文学创作同样体现出“放达”的特色，背离了自己提出的“为时”、“为事”的文学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放达”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元稹、李绅、崔玄亮、令狐楚、刘禹锡、裴度、张籍、李绅等，都转向闲适诗创作，表现出与白居易相同的艺术趣味。这些人的诗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与白居易诗相差无几。如刘禹锡诗风雄豪，本与白体有别，但在政治热情衰减后，所作多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感受；与白居易等人的唱和、联句诗，更与白体趣味相同。可以说，时至中晚唐，“放达”已经成为广泛流行的时代风气。

作为宋初“白体”的重要代表，王禹偁“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它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③①}（p.5）。然而，王禹偁学白，不是堂下架屋，愈见其小，而是有所超越。王禹偁诗歌，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发展了白居易的“独善”、“吏隐”，更重要的变化是诗歌主题出现明显地由吟咏情性向“言志”传统回归的倾向，突破了白居易式的闲适之情、放达之性，而代之以纵横之志；艺术风格则体现为在白体的基础上，融汇多家诗风，广采博取——“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④①}（卷十）、“李白王维并杜甫，诗颠酒狂振寰宇”^{④①}（卷十三），形成爽朗挺拔的“纵横”之风。

王禹偁对白居易的超越是建立在多方面学白的基础上的，他并未能完全摆脱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王禹偁有很多诗的构思都是借鉴白居易，像《问四皓》、《代答》与《海棠赠木瓜》、《木瓜答海棠》这类诗，一望可知为学白居易《问鹤》、《代鹤答》及《池鹤八绝句》，他还写了很多像《自笑》、《自问》、《夜长》这类单从诗题上也能看出是模仿白居易表现闲适生活的诗。而他的赠答诗，往往穷摹自己情怀状，又揣摩、悬想对方的行止，甚至详引对方的言语入诗，如《酬放征君》等诗，这些做法都是学习白居易而来。王禹偁有些诗学习白居易，颇有韵味，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小畜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全诗的构思显受白居易的《寒食江畔》启发：“草香万方数据

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还似往年春气味，不宜今日病心情。闻莺树下沈吟立，信马江头取次行。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邳明日是清明。”^{⑤②}（p.340）不过，王诗要比白诗亲切有味，尾联“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比起白诗的“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邳明日是清明”来，显得含蓄蕴藉，余韵不尽。然而，王禹偁的功绩决不在于对白居易休闲文学的继承上。王禹偁为人“骀儻自信”^{⑤③}（p.9804），自称“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绹、崔群间，斯无愧矣”^{⑤③}（p.9799）。与白居易早年就有浓厚的消极意识、中年即放弃“兼济”之念惟务闲适不同，更有别于苟且偷安于乱世的冯道、李日方等人。王禹偁的“骀儻自信”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变“放达”为“纵横”，凸现士大夫直躬行道的人格精神。

面对仕途穷达，王禹偁的“骀儻自信”表露无遗。他的仕途比白居易坎坷，凡遭三谪，但始终不改其操守。再遭贬谪后，王禹偁自我总结道：“始贬商州，实因执法；后出滁州，莫知罪名。”^{④②}（卷二二）毫不妥协；“八年三谪”后，又作《三谪赋》明志：“效仲尼之日省兮苟无所为，虽叹凤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而行之。”^{④③}（卷一）向主宰其命运的当权者发出挑战宣言，表白自己宁折不弯的决心。王禹偁不仅“遇事敢言，忤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⑤④}（p.9799），也颇具远见卓识，针对宋王朝痼疾提出的“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等变革主张，无不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和一个正直封建士大夫针砭时弊的勇气和胆识。“骀儻自信”而又怀才不遇，发为歌诗，其作品中也充溢着生气淋漓的纵横兀傲精神。林逋说“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在中唐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白居易的“放达”既有世俗性、享乐性的一面，也有全身远祸的现实动机，王禹偁的“纵横”，显然不是漠视现实、超然于矛盾冲突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现实人生；与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异”^{⑤⑤}（p.9804）。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执著现实人生的“纵横”精神，把白居易以来封建士大夫的谪官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再以吟咏知足保和的闲适生活作为诗歌的主题，而是发出不平之鸣；不再将写诗看作是“吟玩情性”的消遣方式，而把诗歌作为精神上的凭藉和依靠——“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物华”^{④④}（卷九）；这才是王禹偁给文学灌注的新的时代精神——评

价王禹 也应从此着眼,而不是像一般文学史著作那样,纵论其如何继承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传统,又如何学习杜甫关心民瘼,横比他是否比同时代诗人创作了更多反映贫苦农民的遭遇的作品,诗歌是否更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王禹 自称其《小畜集》为“谪官诗什”^{〔4〕卷十三}。抒发由贬谪而引起的人生感慨是王禹 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对此类诗作,王禹 非常看重:“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4〕卷十}这部分作品,有的抒发才高命薄的慨叹——“才高宁免妒,命薄不如闲”^{〔4〕卷十},每当产生这样的感触时,他往往将自己与怀才不遇的贾谊相比:“左宦寂寥惟上洛,穷愁依约是长沙”^{〔4〕卷八}、“应笑同时东观客,商 吟憔悴似长沙”^{〔4〕卷八},乃至“凭高朗咏沉湘赋,自许吾生似贾生”^{〔4〕卷九},借咏史抒发感慨:“霸业固以盛,帝道或未全。贾生多谪宦,邓通终铸钱。谩道膝前席,不如衣后穿。使我千古下,览之一泫然。”^{〔4〕卷三}明对遭贬的贾谊深表同情,实则指责当朝执政者不能用贤,害得自己抱负成空。卒前不到一月上“谢表”还说:“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5〕p.534},至死还为自己抱负成空喊冤叫屈。王禹 的志向是安边富民,辅君除佞,畅谈理想是其诗歌“纵横”的重要表现。“苟非秉陶钧,即去持矛楯。致主比唐虞,安边如卫霍……空言说王道,肆眼看人瘼。多惭指佞草,虚效倾心藿”^{〔4〕卷三}、“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4〕卷四}、“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疗”^{〔4〕卷六}、“安边不学赵充国,富民不学田千秋。胡为碌碌事文笔,歌时颂圣如俳优”^{〔4〕卷十二}……与其说是诗人因功业无成而心怀愧疚,毋宁说是诗人为自己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愤慨。对阻挠他实现理想的佞幸,王禹 的斗争毫不妥协,如前所引《对雪》所表白的“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在《谪居感事》中,他还声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哪怕是“如弦伤讦直,投杼觅瑕疵”、“佞权回北斗,谗舌簸南箕”^{〔4〕卷八}诗人也在所不避。王禹 想要建功立业的“纵横”之志、屡遭贬谪的愤懑之情,集中表现在《吾志》中:

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自谓志得行,功业如皋夔。既登俊秀科,人在清切司。谏纸无

直言,论诤多愧词。黽勉为何事?亲老与妻儿。一旦命执法,嫉恶寄所施,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斥逐深山中,穷辱何羸羸。于张及不得,安用此生为?(原注:于定国、张释之)(《吾志》,《小畜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所抒之情壮大,所言之志高远,回环吞吐,沉郁顿挫,“致君望尧舜”的情怀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相同。诗到王禹 这里,“言志”特征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白居易对其吏隐生活多有吟咏。吏隐,是白居易中年以后诗歌最重要的主题。王禹 对此主题做出重大发展。“仕”的对立面是“隐”;“仕”给士大夫提供展露身手的舞台;“隐”为士大夫保留了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仕或隐,是每个封建知识分子都要作出的选择。“中和”的白居易选择了“吏隐”,但他中年后的人生实践重心,在“隐”而不在“吏”。王禹 则与之相反,更重视“吏隐”中的“吏”。王禹 笔下的“吏隐”,在故作放达的外衣下,屡屡露出傲岸贞刚的“纵横”底色。

出仕前,王禹 曾对“吏隐”作了一番精彩的描述:

(咏)为文落落有三代风,今春举进士,一上中选。将我王命,莅乎崇阳,分君之忧。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贤,亦孔之乐。波映鹦鹉洲,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鸣琴,足以振穆若之风;樽有醇醪,足以养浩然之气。维江汤汤,鉴其襟袖;维山峨峨,媚其户牖。绘浔鲂鲈,果多橘柚。吏隐于兹,足保无咎;且优且游,勿谓江山羞。(《送张咏序》,《小畜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隐”的色彩很淡,“优游”、“无咎”的目的让位于“分君之忧”、“养浩然之气”,与白居易的“中隐”注重“致身吉且安”、究心于世俗利益“穷通与丰约”大不一样。在王禹 的诗歌里,“隐”有大量表现:谪官滁州时所作的《北楼感事》是决心最大的一篇,诗人发誓:“归欤复归欤,无忘北楼诗!”^{〔4〕卷五}一想到“隐”,王禹 便和白居易一样,仰慕陶潜:“黍畦锄理学元亮”^{〔4〕卷十二},表示要仿效陶渊明,躬自稼穡。然而,王禹 虽然一再痛下决心,好像非得归隐不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归隐,一方面君恩未报,“犹期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村作老

农^{〔4〕卷十一}；另一方面功业未成；功名非范蠡，何必泛扁舟^{〔4〕卷六}，因此，最便宜的做法莫过于“吏隐”——隐忍将以有为；报国之功，虽无绩效；事君之道，粗守贞方。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进，黜官亦多。始贬商辇，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大行皇帝渐察非辜，移领大郡，方且精求民瘼，少报君恩。期牵复于词臣，再发挥于王命^{〔4〕卷二二}。无论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操守不变，建功立业的信念不变，在王禹偁看来，报答君上知遇之恩的最好方式就是“精求民瘼”——解除民生疾苦。因此，王禹偁回忆自己的吏隐生活是：“万家呼父母，百里抚惸嫠。敢起徒劳叹，长忧窃禄嗤。宦途甘碌碌，官业亦孜孜。政事还多暇，优游甚不羁。^{〔4〕卷八}”这就是诗人所追忆的“吴门吏隐过三年^{〔4〕卷七}”生活，优游多暇是以辛勤为官——百里抚抚惸嫠——为前提的。隐于公门，除了可以为民兴利，尚可潜心悟道。王禹偁自称“白公为前政，鲁望有维桑。求瘼心虽切，颐神道岂妨^{〔4〕卷七}”，就是效仿白居易的“或出或处，道无不在”。道成了王禹偁排遣仕途穷达进退烦恼的良方：自念一岁间，荣辱两偏颇。赖有道依据，故得心安妥。^{〔4〕卷八}然而，白居易的“道”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贬官江州后，其道就只剩“行在独善”，知足保和，乐天知命；王禹偁虽然“未能行其施”，但他的“道”却秉承乾德“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修辞立诚，守道行己，虽然不得其位；位不能行道，却能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贯注在“懿文德”中，做到“文可以饰身^{〔4〕自序}”，即“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4〕卷八}”——王禹偁终于寻求到谪宦、吏隐生活的精神依赖：道与诗。有了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不仅让王禹偁做到“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还使他的文学创作充满使命感。诗在他的心目中如此重要；忙于公事是吟诗^{〔4〕卷十}、“身外除诗尽是空^{〔4〕卷九}”，甚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命屈由来道日新，诗家权柄敌陶钧”，自慰“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4〕卷九}。王禹偁这样说并非全为自嘲，因为“上玄茫昧胡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生有述作死不虚……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长与日月俱。^{〔4〕卷十三}”道德文章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建功立业。贬谪对王禹偁而言，只是“上天于我还心厚，只遣文章道更尊^{〔4〕卷九}”。王禹偁对自己的诗文充满自信：他年文苑传，应不漏吾名。^{〔4〕卷十}与道消息、以诗遣怀，这就为后世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觅得了应付人

万方数据

生穷达、平衡精神废兴的一条可行之道。道和诗两者紧密联系，因为“消息还依道”，所以他不仅能傲然面对人生的浮沉起落，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诗歌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与满腹牢骚：“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泄黄陂。^{〔4〕卷八}”对最高当权者的挖苦——“投杼觅瑕疵”、“责薄赖宸慈”^{〔4〕卷八}；“时清郡小应多暇，感激君恩养吾身^{〔4〕卷十}”、对奸佞的讽刺——“巧宦或五鼎，甘贫唯一瓢^{〔4〕卷十}”，以及事实上难以做到的归隐，统统借诗歌创作做到了。以“自强不息”的“道”为支撑，发为“狂吟”，自然就呈现出与白居易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放达”截然不同的“纵横”特色。

王禹偁虽然把白居易当作楷模、引为同调，说“本与乐天为后进”，但他的精神气质显然不会选择放达人生。李昉之子李宗谔写信给他，劝其“看书除庄、老外，乐天诗最宜枕籍”，通过王禹偁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不满李宗谔所开的这剂麻醉药的：“乐天诗什虽堪读，奈有春深迁客家。^{〔4〕卷八}”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得他的诗歌创作超越了白居易表现自我“乐天保和”的层次，流露出一股傲然之气：商辇邠鲁虽迢递，大抵携家即是家。^{〔4〕卷九}谪官滁州时写下的诗句“官供好酒何忧雪，天与新诗合看山^{〔4〕卷十}”，无疑就是宋代士大夫代表人物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前奏。这样，王禹偁诗作就在白居易的底色上，突出了“不随天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4〕卷九}”的正直士大夫的人格精神，经后人发扬光大，成为宋代文学的根本精神；王禹偁也因此成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清人吴之振评价王禹偁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6〕p.13}”有宋建国之初，文臣主要是由南唐、西蜀及后周入宋的降臣、旧臣，他们左右着宋初文坛风尚，欧阳修评徐铉兄弟：“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盖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丧，而二君者能自奋然为名臣。而中国既苦于兵，四方僭伪割裂，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优游其间。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徐得为王臣，中朝人士皆倾慕其风采。^{〔7〕p.2321}”“二徐”文学成就并不很高；“粗有文物”而已，即便如此，“中朝人士”尚且“皆倾慕其风采”，宋初文坛之芜鄙可想而知。这些人以学习、写作白体诗相号召，内容单薄，多流连光景、“吟咏性情”之什，继

承的是白居易以来的封建士大夫休闲文学传统。他们互相酬唱劝勉 ,风行朝野。宋代文学很长时期内摆脱不了平庸的局面 ,所谓“ 宋兴七十余年 ,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景极矣 ;而斯文终有愧于古 ,士亦因陋守旧 ,论卑气弱 ”^⑧。在这样一个自晚唐五代以来“ 放达 ”之风积重难返的文坛风气背景下 ,王禹 文学创作成就就显得难能可贵。因而欧阳修自谦道 :“ 想公风采常如在 ,顾我文章不足论。 ”^⑦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诗文革新的先驱的钦佩之情 ;而宋代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苏轼与黄庭坚 ,都没有抹煞王禹 的贡献 ,苏轼说“ 故翰林王公元之 ,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⑧。清代袁枚曾有疑问 :“ 以黄山谷之

奥峭 ,宜薄西昆矣。而诗云 :元之如砥柱 ,大年若霜鹄。王杨立本朝 ,与世作郭郭。 ”^⑨其实 ,西昆体诗讲究用典这一点与黄庭坚还有相似之处 ,真正“ 宜薄 ”的应该是白体诗人王禹 。上引苏轼的话可为袁氏之疑作解 ,欧、苏、黄三大家论王 既看重王禹 文学贡献 ,更激赏其“ 风采 ”“ 直道 ” ,盛赞其“ 耿然如秋霜夏日 ,不可狹玩 ,至于三黜以死 ”^⑧人格精神 ,高度评价了王禹 的贡献。在因袭摹拟成风的宋初诗坛 ,正是王禹 以“ 纵横 ”之风超越了白居易以来“ 放达 ” ,冲击了当时诗坛熟软滑腻之风 ,为宋初诗文创作的靡弱平庸局面带来一道亮色 ,起到了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道夫先路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宋)林逋 .林和靖先生诗集 [M].四部丛刊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2](唐)白居易 .白居易集 [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钱钟书 .宋诗选注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4](宋)王禹 .小畜集 [M].四部丛刊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5](元)脱脱 .宋史 [M].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清)吴之振 .宋诗钞 [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宋)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M].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8](宋)苏轼 .苏轼文集 [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9](清)袁枚 .随园诗话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From Self – Indulgence to Moral Integrity :
On Wang Yuchen’s Surpassing Bai Juyi’s Poetry

LU De – h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ai Juyi took a self – indulgent life after he was degraded to jiangzhou. He tried to be divorced from reality ; accordingly , his poetries began to sing his private feelings and his nature ,whose principal content is the leisure and comfortable daily life of officials in feudal China. His character , deeds and his literary style , were respected as models to imitate by later generations from the later Tang dynasty and Five – dynasty historical period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Wang yuchen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literature of relegated official and the literature of hermit in official that originated from Bai Juyi , and he poured his haughty and steadfast personality into the literature , his poetries full of spirit of the time. Wang is not just imitating Bai Juyi , but preceded him ; his poems turned back to the convention of poem are to express one ’s will. Wang yuchen took a moral integrity spirit of that time into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 and he is regarded as the predecessor of literature renovation that came up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Keywords :self – indulgence ; moral integrity ; content with oneself ; hermit in officialdom